

抗战文学研究在台湾

李 延

抗战文学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是“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中国新文学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台湾当局对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三十年代作品的禁锢,造成台湾学者对这一段文学研究的空白。1979年“七·七”前后,由于台湾地区有关学者的努力,这一禁区才被突破,从而推动了抗战文学的开拓性研究。随着这一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台湾学术界比较能够用现实主义的态度来对待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虽然在研究的角度、思想方法和言词上,或多或少地带有反共的主观色彩,但去芜存菁,透过表象,我们也应肯定其一些研究成果。这具体表现在对抗战文学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上;表现在对抗战文学的概念和时限的界定上;表现在抗战文学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继承和发展关系的探讨上;表现在对抗战时期的文学作品文本的考订、研究和对一些空白点的填补上。本文拟就这几个问题作一些鸟瞰归纳和介绍,以求引起大陆学术界的关注,有助于两岸的学术文化的交流。

一、对抗战文学的整理和再创作

对抗战时期的文学的基本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出版,是近年来台湾文学界的一大成果。多年来台湾文学界对中国抗战文学的认识与评价,采取的是低调的甚至是回避的态度。因为,“一谈到抗战文学,就难免涉及三十年代文学及作家,一提到三十年代文学及作家,就感觉到尤如烫手的山芋,总认为那是‘左倾文学’……”^①对这种认识和做法,近年来引起了各方的不满与抨击。如端木野在《整理抗战文学》一文中说,“其实,这是一种很大的缺失,假如让抗战文学留一空白,试问一部近代的中国文学史该如何写下去?对历史作一交代,对文学作一回顾,整理抗战文学,让年轻的一代有所认识,实为一意义重大的工作……抗战期间,好的文学作品,多得不可胜数,无论质与量,都在我国文学创作史上耸现出空前未有的高峰,而今天我们竟然忽视其存在的价值,甚至避而不谈它,这真是匪夷所思了。”^②赵滋蕃也在《这样的创痛,还要沉默?》一文

① 端木野,《整理抗战文学》,《台湾新闻报》副刊,1979年7月12日。

② 端木野,《整理抗战文学》,《台湾新闻报》副刊,1979年7月12日。

中强烈地呼吁说：“当年浴血苦战的将士若不留下苦战的第一手纪录，死生之际的独特经验；当年饱受日寇蹂躏，尝尽国破家亡，颠沛流离之苦的民众，若不留下刻骨铭心的惨痛的回忆，则八年抗战，在历史长流中依旧是过眼烟云。”^①而痼弦更呼吁对抗战文学要进行再创作；对这段血泪战史，既设在文学给它一个定位，更没有透过现代文学形式，创作出反映抗战精神的世界级文学作品，这，应该是整个民族的憾事。^②

在上述认识的驱动下，台湾有关专家学者开展了抗战文学研究的基础工作。对抗战文学的资料研究工作，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对抗战时期参与文学创作的人和事的具体情况进行记录、汇编和整理；二是呼吁“集合我们这代人的记忆力，在可见的范围以内把事实的真相弄明白，让未来的大作手完成一部类似《战争与和平》那样的雄伟高远之作。”^③前者是整理出版抗战文学作品和作家传记，是文学材料与文学史料的保存；后者是搜集整理回忆资料为再创作打好基础。再创作抗战文学作品，是对抗战史的全面扫描与纵深探索，是对现有作品范围的扩大与内容的提升，创作出无愧于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的伟大作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有人具体提出创作必须具备的如经验、感受、才情、功力等四个条件。配合以安定作家生活；提供充分史料；放宽写作尺度等等条件^④，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创作条件无法造成，因而成效不多，“截止目前为止，叙写抗战沧桑的创作在质量上都嫌不足”^⑤。

而关于抗战文学作品的整理出版，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如《抗战时期文学回忆录》^⑥，收录了任卓宣、苏雪林等 28 人的回忆录，内容是他们在八年抗战中的文学活动，和他们在当时文坛的所见所闻的回忆。周锦以个人的力量整理出版了 4 本抗战的诗与散文选集，分别题为《中国的胜利》、《中国的奋斗》、《中国的怒吼》、《中国的苦难》（《中国新文学丛刊》1979 年 6 月，台北智燕出版社出版）。黎民文化公司出版了《抗战文选》，分小说、散文、报导、传记、诗歌等。谢嘉珍也编有《抗战文选》8 册出版。各类新文学史中，尹雪曼的《中华民国文艺史》（1975 年 6 月，台北中正书局）、周锦的《中国新文学史》（1976 年 3 月，台北长歌出版社）等，内中都专列有关抗战文学的章节。此外，作为专史的几种著作也很有参考价值。如舒兰的《抗战时期的新诗作家和作品》（1980 年 5 月，台北成文出版社）、尹雪曼的《抗战时期的现代小说》（1980 年 5 月，台北成文出版社）、刘心皇的《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1980 年 5 月，台北成文出版社）和《抗战时期沦陷区地下文学》等。台湾的《青年战士报》、《联合报》、《文讯》的副刊和《幼狮文艺》、《现代文学》、《文讯》等刊物为抗战文学出了专栏、专辑^⑦，这些，对抗战文学的研究均有些影响。

以抗战时期文学生活为内容的回忆录也很有研究和史料价值。在台湾的一些作家如尹雪曼、陈纪滢、孙陵、刘心皇、徐訏等，他们都是在抗战时期开始创作或者取得较多成就的，尽管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们一方面对政治观点相同的作家评价过高，有意拔高，另一方面对真正有

① 赵滋著，《这样的创痛，还要沉默？》1979 年 7 月 12 日《台湾新闻报》副刊。

② 痼弦，《一代一代地写下去！》，刊《抗战时期文学回忆录》，文讯月刊杂志社，1987 年 7 月 1 日。

③ 赵滋著，《这样的创痛，还要沉默？》1979 年 7 月 12 日《台湾新闻报》副刊。

④ 慧人，《抗战文学的整理与再创作》，《中央日报》副刊，1979 年 7 月 25—26 日。

⑤ 痼弦，《一代一代地写下去！》，刊《抗战时期文学回忆录》，文讯月刊杂志社，1987 年 7 月 1 日。

⑥ 《抗战时期文学回忆录》，苏雪林等著，文讯月刊杂志社，1987 年 7 月 1 日版。

⑦ 《文讯》第七、八期合刊《抗战文学口述专辑》经重新订正，增补后改题为《抗战时期文学史料》（秦贤次编著）、《抗战时期文学回忆录》（苏雪林等著），加上据各种书报杂志中收集有关抗战文学的专文汇编成册的《抗战文学概论》，结集成三册本《抗战文学资料丛书》出版。

成就的进步作家竭力贬低,甚至诽谤诬蔑,如金剑的《从抗战文学说起》、梁锡华的《记巴黎所谓“抗战时期文学研讨会”》等文,歪曲了文学发展史的面貌。但有些回忆资料,颇有学术史料价值,尤其对抗战时期有关国统区的文学史料,弥补了大陆研究的不足。对于台湾学术界中这种不良的学术风气,一些能持公允之论的学者提出了批评,主张抗战文学的史料整理“不能偏颇”的正确意见,建议“一、向现在台湾或海外”的“作家征求抗战作品,尽量搜集,以免沧海遗珠”;“二、整理出版抗战文学作品,不同于编印一般选集,不能偏颇,应着重于作品的保全。我们应该把抗战文学作品当作文学史料看,以供后人再创作时借镜参考。”

二、抗战文学的概念和分期

关于抗战文学的概念和分期,在台湾学术界也有多种说法。痲弦说所谓“抗战文学”可以分作几个层次来看:其一是抗战期间作家基于爱国、救国的热情写出的作品,内容描写日军残害国人的暴行。这样的文学作品,其特色是具有强烈的抗议性,强调内容的现实精神,并不特别重视文学性。第二种抗战文学,“是透过左翼文学观念和美学表现出来的文学”。此外,抗战时期的沦陷区文学是亟待整理的另一范畴。象徐许的《风萧萧》便是写于沦陷的上海,这又属都市小说了。部分身陷沦陷区的作家,无法发表实质的抗战文学,于是转趋纯艺术倾向,写下了水准以上的作品;这类作品虽较个人化,与抗战无关,却可归为抗战文学的一个支脉。至于东北作家群的战时作品,姑名之为边陲文学。而以谄媚异族为目的的汉奸文学,绝不能列入这一范畴,是反抗战文学的作品。其三是新抗战文学。^①周锦在《抗战文学的整理与研究》^②一文中,则认为“抗战文学”与“抗战时期的文学”本来是应该有所分别的,前者依著内容题材,后者根据写成的时间。只是事实上很难分得清楚。诸如梁实秋的“小品”,没有写抗战,却是抗战那个时代和环境特有的产物。再如陈纪滢的《华夏八年》,是50年代才写起来,内容却完全是抗战的;至于萧红的《呼兰河传》,出于抗战作家之手,文学成就极高,写成和出版也都在抗战时期,可是所写的内容与抗战没有一点关系。因此,周锦认为“我觉得这一方面的研究,应该把握抗战时期的全部文学作品,也就是以时间的因素为主,再加上不属于这一时期而内容是表现抗战的各类高水准作品,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关于抗战文学的时限,墨人的观点是从时间划分,作断代描写,自“七·七”芦沟桥事变至抗战胜利这八年期间,以这段时间内的史实,作为描写的重点,自然理所当然地应称之为抗战文学;如果时间向前推到“九·一八”,向后延长到1949年国民党集团退至台湾止,“其实都可以称之为抗战文学”^③。后一种划分的前提是,如果没有抗日战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力量的壮大,国民党也不会失去在大陆的统治,这后一种划分法的下限到1949年,其理由和时限,笔者不敢苟同,于情于理都说不通,且有些荒谬了。除了这些分法外,也有人把抗战文学的起迄时间确定而作弹性的延伸。还有“是以抗战八年为原则,再把与前因后果有直接关系的加上,勉强作为一个界定”。^④

① 痲弦,《一代一代地写下去!》,刊《抗战时期文学回忆录》,文讯月刊杂志社,1987年7月1日。

② 周锦,《抗战文学的整理与研究》,刊1984年2月20日,《文讯月刊》,第七、八期合刊。

③ 墨人,《抗战文学的整理与再创作》,《中央日报》副刊,1979年7月25—26日。

④ 周锦,《抗战文学的整理与研究》,刊1984年2月20日,《文讯月刊》,第七、八期合刊。

对台湾抗战文学的研究和资料搜集做出相当成绩的周锦还指出了“除了时间,地域也还是一个不算小的问题”。他说历来中共文学史家都在采取二分法,分做白区和红区,或是国统区和解放区,我们却不曾考虑到这一问题,一直含着混着”。他认为两种地域分法“都不合适”,提出了他的分法:(一)政府区的;(二)沦陷区的(包括东北和台湾);(三)敌后游击地区的;(四)海外华侨的。当然,每一个单元内,还会有左、有右、有中间。就以同在沦陷区的文学来说,有汉奸嘴脸的歌颂,也有热血沸腾的反抗;有高人雅士的吟哦,也有舞女姨太太的色情;不过,这些都是不应该遗漏的。而周锦的这一观点中最可注意的是考虑了包括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游击区的文学成就,这是符合抗战文学的发展历史的真实情况的。

三、抗战文学是新文学的发展

台湾的有关研究者一般都认为抗战文学是新文学的延续与发展。如痖弦认为从文学史的观点看,抗战文学对整个新文学具有无比深远的意义,事实上它促成了白话文运动的开花结果。因为在1917年,胡适、陈独秀倡导白话文学,但当时的文学的精神和语言尚未成熟,写作题材和内容也局限于个人狭隘的圈子,语言虽然白话了,许多地方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旧文学的束缚。抗战这一声警钟,蓦地唤醒了整个国族的灵魂,作家的感情因之得以奔湃、激昂起来;生活的磨难,更导致战时作家的观察面扩大,经验也益趋成熟,于是,文学朝前迈进了一大步。抗战文学不仅描写了流离八年中的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大迁徙、大结合,同时扩大了我们的眼光和胸襟,全民文学,莫基于此,民族文学,萌芽于此。^①另一方面。因应于唤起民众的目的,许多文学新形式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诸如话剧、报告文学、朗诵诗等。也有论者认为,整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自1917年的新文学运动开始,中国现代文学到现在不过才七十余年,而抗战文学加上前因后果,几乎概括了它的绝大部分,因此将整理现代文学史料看作是整理和研究抗战文学的先决条件。^②朱介凡则论说“抗战文学在新文学运动的开花结果”。他说1919年新文化运动,由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到了抗战期间,用白话文写作的作家已趋成熟,如果把白话文运动初期的作品与抗战时期的作品,作一个比较,会发现白话文运动初期的作品简直就象老太婆的“小大脚”,不大不小没个样子,白话文运动到了抗战时期才算开了花,新人辈出,佳作如林,就纯文学的意义而言,这阶段的文学不容忽略。夏志清的《我要写一部〈抗战小说史〉!》^③中的一个观点也很可注意,他认为抗战文学,当然初期大多以抗战为主题,但是到抗战后期就变了。其实我觉得抗战文学的特色是当时作家在作品中表现出怀疑过去小说的精神,萧军可以算是一个代表。同时因为日本人的入侵中国,占领了中国的领土,国人对自己土地被掠夺的悲痛和对土地的怀念,发展出了关爱农村的文学,我认为这是抗战文学中不应忽视的亮点。”

李瑞腾的《抗战文学概论·序》^④中就八年抗战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和影响提出了看法。他认为抗战文学对新文学的发展所具有的关键地位,表现在,“随着战局的演变,文学人力向四方扩散,突破原来以北平和上海为中心的小格局,这种文学空间的结构变化,使得新文

① 痖弦:《一代一代地写下去!》,刊《抗战时期文学回忆录》,文讯月刊杂志社,1987年7月1日。

② 周锦:《抗战文学的整理与研究》,刊1984年2月20日,《文讯月刊》,第七、八期合刊。

③ 见李瑞腾编的《抗战文学概论》文讯月刊出版社,1987.7.1。

④ 见李瑞腾编的《抗战文学概论》文讯月刊出版社,1987.7.1。

学有更大的活动空间和群众基础,其在各地播下的文学种子,如若有肥沃的文学土壤,终必会发芽、茁壮的。”而这些观点与过去海外中国现代新文学研究者贬抑的,抗日战争时期为中国新文学的“凋零期”、“中国现代文学在抗日战争时期开了倒车”的说法,是进了一大步的。

台湾有些学者认为:抗战文学虽经血与火的洗礼,但并没有因此而“提高文学的品质”,消化西方文化的影响,而创建新的民族风格。王聿均在分析其中原因时认为,战争一起,作家受到空前的冲击,纷纷走出书斋和亭子间走向战地和乡村,生活的圈子扩大,“创作的成绩反而锐减”。在抗战初期,文学和宣传合一,所以产生了不少文学的宣传品,有的套用民间的旧形式,有的则为新形式,如通俗文学、报告文学、朗诵诗、街头剧等,都成为时代的宠儿^①。其优点在能深入民间,被称作文艺的“轻骑兵”,“缺点则为终非文学的正宗”。……报告文学包括特写、通讯等,用简洁的形式,通俗的语言,其目的为走向“文艺大众化”的途径,与朗诵诗、通俗文艺“异途同归”^②。这些时间一久,便难以满足作家和读者的希望。笔者以为这种分析,貌似有理但失之偏颇,如何看待抗战文学的“品位”问题,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问题,但不属本文探讨范围,在此不展开论辨。

四、对抗战文学文本的评价

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运动主要由几部分构成:一是延安与各抗日根据地的抗战运动,一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抗战文学运动,一是以上海孤岛为主的沦陷区抗战文学,这三个不同地区的抗战文学是相互声援,相互交流而结成一体的。三个地区的抗战文学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各以自己的特点,构成中国抗战文学的整体,成为新文学发展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重要阶段。^③而台湾的研究者,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文学力量有两种不同的研究态度:一是站在反共立场上全盘予以否定,如钟雷的《从抗战文学谈起》、赵友培的《中共利用抗战文艺壮大自己》、李永刚的《不要怕谈,抗日文学是我们的》等等,二是站在“全民族共同抗战”的客观立场上对抗战时期左派文化人及其创作的首肯,对抗战时期的文坛也作了较客观的描述,并呼吁全方位结集、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出版抗战文学作品。如王聿均的《抗战时期文学之演变》^④一文,对抗战文学的背景作了较全面的讲述,对抗战初期文学所遭受的冲击作了介绍。在“战时文坛的空间分布”一节中,对国统区的左、右两个阵线进行了分析和详解。在国统区文学中再分重庆、昆明、成都、桂林、延安以及孤岛上海的文化活动、文艺政策、文学思潮作了简介。尤其是对文学界的空前大联合,和国共双方的文艺路线的争论作了介绍。这确提供了一个较完整的抗战时期文学盛况的大轮廓。这在台湾的研究者中并不多见,得到了胡秋原等作家的重视。此外,有人还主张对抗战文学的研究必须取得足可做为代表的作家及作品,“擘肌分理,以突显其相合时代的各项因素。除此之外,我们是否有可能超越那个时代的政治意识之抗争,以还原文学历史的真相?”“或许我们该自我期待,不论只是真之探求,或者是以史为镜,都应该从

① 蓝海:《中国抗战文学史》,第四章《通俗文学与新型文学》。

② 《抗战与艺术》,转载穆木天《关于报告文学》,原刊于《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十一期。

③ 苏光文:《抗战文学概观》,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12月版。

④ 王聿均:《抗战时期文学之演变》,1985年12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战建国史研讨会论文集》。

根本的学术立场出发,以不违抗此时此地的集体意识为依归。”^①这些话中的弦外之音还是不难听出的。

对抗战文学的艺术性问题的讨论,台湾的研究界确实走过前述的“漏零期”说和“开倒车”说的阶段,在肯定了抗战文学是对新文学的延续和发展——这主要是指文艺新形式的繁荣与文化向大众的普及——的前提下,总的倾向是认为囿于抗战的具体严酷环境,抗战文学的形式显得简单与顾及实用性、在唤起民众的目的下,这类作品的精神和情感虽极丰沛,形式方面难免比较粗糙。有人认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战时的特殊性导致文学走向彻底的实用性,为达到立即的宣传效果,情绪化的宣泄、煽动性的叫嚣,实难保文学之品质,以至于出现大量粗糙的滥情之作。于今重读,我们必须体会此乃时代所造成的必然,庶几不致误用评判尺度,引出不合情理的评价。”^②也有论者说,将此归因为政治的关系太过密切,作家多在政治与文学之间徬徨,致影响到独立的创作,益以战时的转徙流离,战后的动荡不安,作家已无力表现一个时代的精心巨制。”“抗战文艺”一词,本身就代表极显明的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置宣传于艺术之上,尤具政治意义。^③

台湾的抗战文学研究中对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的研究是很有成果的。如刘心皇的《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④一书,是比较引人注目的。这本书虽不算是文学史专著,它只是简介了上海、南京、华北和东北等地沦陷区的时代背景和文艺组织、团体、刊物等文学活动情况,以及这一地区的162名作家的简历。而对整个沦陷区文学及其主要作家和作品则缺乏系统研究,“同时,对于情况不同的作家作品也未能作出具体分析和对待,一概笼统地扣以‘落水作家’的帽子,这种做法是很不恰当的。”^⑤台湾的周锦也指出此项研究的缺失在于作者是为了“分忠奸”和“作后人警惕”,没有能从作品方面做深入的推敲和发挥,诸如社会人心和政治环境,孕育出的文学畸形等。^⑥但这书可谓是目前为止的仅有的一部沦陷区文学的专著,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它所收集的材料,却还多是过去的现代文学研究工作中很少注意的,即使大陆的文学研究对沦陷区文学的评论也几乎是空白,在一些著名的关于中国新文学史的专著中,也鲜有论及。值得一说的是,近年来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⑦中列出《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的文学思潮》一节,对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潮和汉奸文学——“和平文学”思潮进行评论,这确是大陆文学界对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研究的转向积极的一个重要进展。

综观台湾近十几年间,对中国的抗战文学的研究,的确可说是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有些研究,对大陆的文学评论界应该有可借鉴、参考之处,尽管内中掺杂着过多的政治上的陈词滥调。应该承认,在台湾,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抗战文学方面的研究禁区已被打破,走向实事求是的研究,必定会结出更多的硕果。

① 见李瑞腾编的《抗战文学概论》文讯月刊出版社,1987.7.1。

② 见李瑞腾编的《抗战文学概论》文讯月刊杂志社,1987.7.1。

③ 王聿均,《抗战时期文学之演变》,1985年12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战建国研讨会论文集》。

④ 刘心皇,《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台北成文出版社,1980年5月版。

⑤ 张建勇,《评台湾省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文学评论》,1983年第五期。

⑥ 周锦,《抗战文学的整理与研究》,刊1984年2月20日,《文讯月刊》,第七、八期合刊。

⑦ 邵伯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学林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